

后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安德鲁的大脑》

——主体性的解构与重构

樊颂洁

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2年8月9日; 录用日期: 2022年9月7日; 发布日期: 2022年9月16日

摘要

《安德鲁的大脑》是E.L.多克托罗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不同于以往着重关注美国历史的小说, 多克托罗在《安德鲁的大脑》中将叙事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大脑活动及心理活动之中, 通过描绘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的主体性问题, 暗示了其在人与非人界限模糊的后人类时代, 对于人类主体的后人文主义反思, 以及希望寻求新型主体以摆脱逐渐沦丧的人类主体的危局。

关键词

E. L.多克托罗, 后人文主义, 《安德鲁的大脑》, 人类主体

A Study of "Andrew's Brain" with the Posthumanism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Subject

Songjie Fa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 9th, 2022; accepted: Sep. 7th, 2022; published: Sep. 16th, 2022

Abstract

"Andrew's brain" is the last novel of E. L. Doctorow.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novels focusing on American history, Doctorow's "Andrew's Brain" focuses on the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characters. By depicting the various problems of subjectivity existing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t suggests Doctorow's the post-humanism reflection in the post-human era wher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s and non-humans are blurred, boundaries blurred after human age, for human

subject after humanism reflection, and hints at Doctorow's hope to seek new type of subject to get rid of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the human subject.

Keywords

E. L. Doctorow, Posthumanism, "Andrew Brain", Human Subjec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理性，以人的感受为标准，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体现对人类的自我关怀。但在一些学者看来，西方社会过于推崇人的理性、人的价值，以至于演变出排斥其他物种的人类中心主义。后人文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传统人文主义思想的批判基础上的，它是一种后中心化”[1]，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是“其对人文主义所建构的人类主体的颠覆以及其对后人类境况下新型人类主体的重构”[2]。它的重点考察对象是人类主体性的机器性和动物性。

后人文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卡里·沃尔夫曾言：“随着人类不断缠绕在科技、医学、信息以及经济网络之中，人类的去中心化逐渐变得不可忽视[3]。”沃尔夫等后人类理论家认为，对后人类的理论建构不能止于后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文主义的框架。批判性后人文主义也因此追溯人文主义的源头，尝试“颠覆人文主义的诸多价值预设，从而纠正二分法和本质论的迷思”[4]。因此后人文主义主张消解人文主义所主张的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从所认为的处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地位回归到自然万物中，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环境以及非人类和谐共处的交互联系。此外，后人文主义批判区域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等，竭力消解现实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如男女二元对立、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等文化上的不足和缺陷并尝试重构身体与心灵，男性与女性，人类与非人类的和谐统一关系。“通过这种重构，塑造和发展出不同于当前的具有新的伦理，新的审美，新的对社会和文化的认知的‘后人类’主体[1]。”

2. 人文主义主体的解构

2.1. 人文主义主体形象之解构

自古希腊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来，经典人文主义便一直视人类为一种中心的理性主体。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画作“维特鲁威人”体现了一种古典人性形象的普遍模式，即人类的男性：白皮肤，欧洲人，英俊强壮。其体现了身体和精神的完美，由此塑造了一种关于人的标准话语——身体上的健康、心智上的健全、道德上的完善。到启蒙主义时期，人的根本与理性关联紧密，康德认为启蒙的核心就是理性和自由，人只有独立自由地运用自身理性才真正是一个成熟的人。因此，经典的人文主义确信人的身心完美和理性力量。

在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中，多克托罗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与人文主义形象相悖的主人公形象。从其外形和身份地位来看，主人公安德鲁确实符合经典人文主义关于“人”的形象，他外形俊朗，智力超群，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白人教授，按照人文主义对于主体的形象来解读，他应该是社会中理性与尊严的完美代表。然而纵观全文，我们难以将其与“理性”和“自由”等词相关联。小说中，安德鲁

本是一名知识渊博、极具声望的认知科学家，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和受人尊敬的工作，却由于忙于工作疏忽大意，给女儿喂错了药，造成了女儿的死亡，开始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女儿死后，妻子无法原谅他，选择与其离婚。安德鲁自己也开始距离所谓的“理性、自由”愈来愈远，为了疗愈自我，他放弃原来的工作，转换了生活和工作环境，却还是时不时被创伤侵袭，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在爱上了学生并与之重新组建了家庭，生活逐渐归于正常之时，他的回归“理性之路”又被战争无情截断。直到小说的结尾，安德鲁终于成为了一个与传统人文主义所界定的理性、自由毫不相干的人：他说话颠三倒四，在总统面前突然倒立表示反抗，失去了工作的自由，被所谓的代表理性的心理医生定义为精神分裂，也再一次失去了抚养另一个女儿的“权力”。在写作手法上，作者通篇采用安德鲁与心理医生的对话来构建全文，采取了看似无序的叙事手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与经典人文主义相悖的“非理性”圣愚的形象，颠覆了经典人文主义对于人性之塑造，同时通过多处细节描写，讽刺了人文主义对于理性的“神话”夸大以及其不可忽视的控制力，消解人文主义意识形态加持在主体身上的束缚。由此解构了人文主义经典的主体形象。

2.2. 人文主义主体本质之解构

经典的人文主义宣称维护人类的人性尊严，倡导宽容的世俗文化，反对歧视与暴力行为，维护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尼尔·巴明顿(Neil Badmington)却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话语[5]，他精辟地阐述了人文主义：“人类自然而永久地占据所有事物的中心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与机器、动物和其他非人类实体截然分开；人类的所有成员共享一个独特的本质。”“在人文主义的叙述中，人类超凡脱俗、独立自主”[6]。他认为马克思开启了后人文主义的可能性，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攻击了人文主义对存在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关系之外的自然人类本质的信念。另外，意大利当代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曾就人类本质问题，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性及非人的产生。他认为人类和动物的区分并不是科学的和自然的，本质是政治的和伦理的。因此他认为这种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分割思维实质是在现代模式下将人动物化。

在小说《安德鲁的大脑》中，作者利用了主人公和心理医生的对话形式，向我们展现了安德鲁自己以及周边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表达了对于人文主义人之本质的辛辣讽刺。小说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生存状态很明显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所宣扬的具有尊严和价值以及拥有平等地位的人类主体相悖。如小说中安德鲁多次回忆了一名优秀的空翻女孩，她拥有完美的空翻技巧，可以不需要“借助任何平台”[7]就能完美掌控自己的身体，可以“在空中翻转 390 度”后完美落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拥有完美运动技巧的女孩，却一直处于一种“被凝视”不自由状态。她的经纪人邀请别人随意观看她，评价她。还对她实施侵犯，她无疑是受制于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是完全处于受他者掌控的状态，这一形象的塑造从根本上背离了人文主义所宣扬的人类本质。

除此之外，在小说中，作者对于安德鲁未婚妻布萝妮的侏儒父母的一些经历描写，与阿甘本所谓的现代社会将人动物化的观念相契合。布萝妮的父母都是在形体上与正常人差距甚大的“微型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被歧视排斥，因为易于掌控，被侏儒国际经销商带去世界各地演出，虽然因此获得了工作，取得了一种另类的“自尊”，然而他们本质上却像动物一样被操纵，被他人观看、凝视，成为了政治中的“非人”形象。他们的存在，无疑是扰乱了经典人文主义的平等、自由的“人类”主体范畴的。在安德鲁与心理医生的交谈中回忆他们的经历时，他辛辣地指出类似侏儒这样的群体其实在社会中根本得不到哪怕是“虚构的”身份的[7]，并讽刺一些“典型的欧洲做派”：以“畸形的嘲弄方式”实施殖民化，发动战争，残害“赤裸生命”。体现在文本中总统借打击 911 恐怖分子之名，不顾其他种族的生命随意发动战争，残害生命。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于当代社会主权利力的后人文反思。

除了小说中一些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物，主人公安德鲁作为一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具有

一定社会地位的他仍然逃不脱与人文主义所塑造的主体相背离的命运。尽管他与现任总统是大学室友，并且被邀请去白宫工作，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总统政治之路的棋子，总统利用他制造有利的舆论导向，在总统和其身边人眼中，安德鲁不过就是一台聪明却永远不会反抗的“机器”，他的所有建议都不会被采纳，他的所谓的“工作”也毫无意义，也根本不会有人去在意他的“人性尊严”。除此之外，小说中“总统”形象的塑造也与安德鲁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管理一国的总统，他本更应该是理性，自由的象征，然而在作者笔下，他却也像一台机器一样，受到身边政客的控制，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皇太子”“没有尊严”，不过是政治运作中的一部分。作者通过对现代社会中拥有不同身份的人物描写，表现了他们身上一个相同的特质，即被“非人化”，以及与人文主义经典的主体形象无法契合的本质特征。

3. 重构和谐统一的后人文主体关系

自后人文主义思想诞生以来，西方学界就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思想进行了解体性批判，对于人类主体性的理解倾向也不再是单一化，其中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对传统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思想进行了具有批判性质的解构。经典人文主义的人类主体观认为主体是具有特权的主体，其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对一些所谓“二元对立”中的“他者”的排斥。除了动物、机器等非人类的“他者”被排斥在外，一些同属于人类范畴，却被视作为非人类中心的一些“他者”，也被按照性别、人种等分类而遭到排斥。对此，后人文主义主张“主体通过与所有‘他者’和谐共存，在不去身体化的情况下批判传统的人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人的认知进行改造。即尊重他者，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去不断扩大主体的范畴，以此实现人类与世界的共存、共进化”[8]。

3.1. 两性关系的重构

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问题深刻表现在社会现实中，特别表现在传统的男性中心制中。在男性中心制中，男性被建构为理性和智慧的象征，他们占据男女二元对立中的主体地位，处于理性和进步的统治地位的。然而女性却被定义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她们受到男性的支配，是被动的，顺从的从属者形象，并且受到男性的主导和控制。这种性别对立造成了人类两性关系的失衡，引起两性的对立矛盾。因此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会造成两性间的关系失衡，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问题。而后人文主义者则尝试解构这种男性主体的构成范畴，接受他者进入主体范畴，在真正平等的立场上去不断扩大人类主体的范畴，即解构这种两性的二元对立，倡导两性关系的平等共处，强调两性彼此互补，建立彼此依存的理想范式。

在《安德鲁的大脑》中，作者便通过描写安德鲁与未婚妻布萝妮的两性关系表达了其对于两性关系的后人文解读。小说的一开始，作者便解构了所谓的男权中心论。作为一名白人的，高智商男性，主人公安德鲁却与男性中心主义所塑造的男性特征可谓是无关联，也并非是和勇敢的象征，他缺乏责任感而造成女儿的死亡，内心极度不自信，总是逃避过去，麻木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还不断给他人带去麻烦，在他与心理医生的交谈中读者可以轻易发现，作为男性，安德鲁还一度在生活和工作中失去了话语权，陷入了一种文化失语的状态。同时，作者为安德鲁安排了一场“救赎”，让他遇到并爱上了女学生布萝妮，一个具备理性特征的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安德鲁的回忆中，正是布萝妮的“更人性化”使得他注意到了她，布萝妮是一个十分善良、聪明好学的女性，她在生活中时常展现出一种安德鲁所不具备的“人性”色彩，她会帮助他捡粉笔，会带着极度的包容心去对待他的怪异举动，在学习上，她总是十分渴求知识，对于一切生活和学习所遇到的困难也总是展现出惊人的激情。安德鲁在与她的对比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看到了她“某种内在的光芒，并由此对自己阴暗的存在有所了解”

[7]他逐渐被布萝妮影响,认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逐步摆脱了过去自己的性格“劣质”,也“重新拥有了巨大的爱的能力”[7],甚至获得了敢于向总统反抗的勇气,向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自我主体不断靠近。

弗吉利亚·沃尔夫认为男女两性的理想范式便是“双性同体”,她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种力量一起和谐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9]。小说中,安德鲁和布萝妮其实也是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状态中,安德鲁通过布萝妮获得了理性和人性光辉,布萝妮欣赏安德鲁的“敢于当众承认自己痛苦”[7]和独特的世界观,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勇气和自信,不再为自己的身世而自卑,这个过程使她身上的男女两性力量更加和谐,从而使她成为了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主体。双方在一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完成了主体性别的双向“进化”。因此多克托罗笔下的男女两性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主体间的共生共存,互相帮扶的和谐主体关系,小说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深刻的后人文之思。

3.2.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宣扬的人类的自主性是一种不可靠的神话,认为人与其他生命甚至非生命物质在本质上处于相互构成,彼此依存的关系。所以后人文主义者批判人文主义思想下产生的物种歧视,认为人类应与其他物种形成平等伴生的关系。罗西·布莱伊多蒂曾在自己的著作《后人类》中表示“对于批判后人文主义的当代重构来说,生态学和环境主义是一个完全不同、强大的有力的灵感之源,二者取决于包括非人类或‘地球’他者在内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放大意义上的相互联系[10]。”后人文主体正是一种在与外在物质的合作和伴生下形成的新型共生主体,这种共生主体与宇宙间其他物种甚至非生命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之间以一种彼此受益、非剥削性的方式互动的后人文共同体”[11]。

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同“女性”一样被置于所谓二元对立中的“他者”地位,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状态之中。在《安德鲁的大脑》中,通过展现主人公安德鲁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及变化,多克托罗展现了其主张摆脱自大的人本中心论,试图解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倡导人类与自然平等相伴,和谐共生的思想观念,展现了他隐喻的后人文思想。

《安德鲁的大脑》中主要内容是通过主人公和心理医生的谈话以及他自己意识流般的内心独白来建构的,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实际上也几乎都是通过安德鲁的立场来阐述的,其较为可靠地展现了安德鲁对于自然环境的看法。在这种由对话构成主要叙事的小说中,作者却借安德鲁之口,花费了较多的篇幅来描写人物和自然的相处过程,暗示了人类主体与自然环境的共生性。

安德鲁在失去和前妻的女儿后,选择疗愈创伤的方式便是脱离原来的环境,去亲近自然。他选择搬去了瓦萨奇群山周围的小镇,他喜欢那里的山脉。远离了繁华的城市,住在山脚下,安德鲁开始觉得“瓦萨奇群山主宰着整个小镇”,它们是以一种独立的、“浩瀚冷漠的面目”存在在宇宙中,它们并非受到人类支配,相反,人类“被它们殖民化了”,因为它们“可以自由调配和吸纳光线”[7]。同时,安德鲁又向心理医生倾诉到,自己只是“学院敷衍潦草努力扩充课程的结果”,他“痛苦又孤单”,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却无法把控他的工作和生活,作者通过这种人与自然各自不同的存在状态的对比,解构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随后安德鲁又在靠近自然的过程中打开了心扉,他意识到,自然环境对待人类是平等包容的,他表示,“山脉和天空会消除知识分子特有的绝望”[7],对他而言,瓦萨奇群山就和布萝妮一样会无限包容他,疗愈他。安德鲁似乎逐渐承认,“人在本质上不可避免的依赖性”以及“我们同动物、环境等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性”[12],也就是说,他逐渐摆脱了经典人文主义所构建的一种自主性主体,不再自大地去随意评判和控制外界物质和环境,他不再执着于把控一切,而是选择将自我主体重新定位成和外在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主体。在朝向自然环境包容的属性靠近的这一过程中,

安德鲁逐渐能够以一种谦卑，负责的态度行事，也重新建立了自我与外在的关系，重新建构了更好的主体自我，并在这一阶段摆脱了创伤性的自我主体。作者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暗示了自己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人类展望。

4. 结语

在《安德鲁的大脑》中，作者对于人文主义所构造的主体的反思显而易见，通过主人公安德鲁片段的回忆，描述了各个阶级的主体状态，以此展现了作者对于传统人文主义片面的主体观的讽刺以及对于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后人文主体的积极建构，为后人类时代中人类的生存之道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对于小说的后人文主义主体的解读，有利于帮助人们去理解在当代社会中人类自身的生存之道，以及帮助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和谐共生，建立更加正面积极的后人类伦理关系。

参考文献

- [1] 肖建华. 在后人类时代重思人文主义美学——以海德格尔的后人文主义美学观为例[J]. 当代文坛, 2019(1): 170-181.
- [2] 黄贺, 陈世丹. 《无尽的玩笑》对新型后人文主义主体的构建[J]. 科学·经济·社会, 2020, 38(3): 98-103, 110.
- [3] Cary, W. (2010) *What Is Posthuman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sota, 16 p.
- [4] 蒋怡. 西方学界的“后人文主义”理论探析[J]. 外国文学, 2014(6): 110-119.
- [5] Castree, N., Nash, C., Badmington, N., Braun, B., Murdoch, J. and Whatmore, S. (2004) Mapping Posthumanism: An Exchang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6**, 1341-1363. <https://doi.org/10.1068/a37127>
- [6] Clarke, B. and Rossini, M. (Eds.) (2011)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Science*. Routledge, New York, 374 p.
- [7] E. L. 多克托罗. 安德鲁的大脑[M]. 汤伟,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18, 20, 22, 31, 38, 40, 74.
- [8] 周海宁. “后人文时代”人类主体性研究的传播学反思[J]. 视听, 2018(9): 183-185.
- [9] 弗吉尼亚·沃尔夫. 一间自己的房子[M]. 王还,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120.
- [10] 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M]. 宋根成,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68, 72.
- [11] Cudworth, E. and Hobden, S. (2017) *The Emancipatory Project of Posthumanism*. Routledge, London, 153 p.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562063>
- [12] Kittay, E.F. (2015) Centering Justice on Dependency and Recovering Freedom. *Hypatia*, **30**, 285-291. <https://doi.org/10.1111/hypa.12131>